

一

今年10月28日，是我尊敬的革命前辈杨勇将军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。1970年2月中旬到1971年2月上旬，我曾经和杨勇将军在一起。这是杨勇将军无辜遭受四年打击迫害的最后一年。1971年2月8日下午，我抬着腿伤的杨勇将军的担架，把他送上了周恩来总理派来的军用专机，从石家庄接回北京进行救治。这一天标志着杨勇将军长达四年之久的厄运结束了。

我是1968年3月从苏州应征入伍的战士。1969年，爆发珍宝岛事件，中苏边境全线吃紧。我们连队在邯郸郊区裴堡农场，边战备边军农。1970年2月中旬的一天，无辜被打成“三反”分子的杨勇将军，以“王长树”为名，穿着一身褪了色的没有领章帽徽的旧军装，被吉普车送到了我们连队。安排在三排六班接受“劳动改造”。将军的住房离我所在的二排的营房相距不足10米，我们朝夕相处。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对将军十分不利。工作组经常要他参加各种各样的揭发和批判活动，还要交待自己所谓的“三反”罪行。部队还有专门针对他的“十不准”规定。这是用来防止将军同连队干部战士之间进行接触联系的方法和措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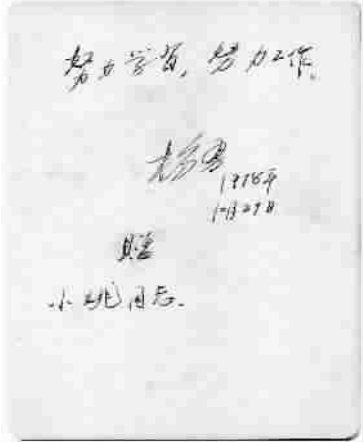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在连队，没有人真把将军当作“三反”分子来看待，更没有人把将军当成阶级敌人来对待。自从有一天，有战士在将军自己带在身边的一只小折椅上依稀发现了“杨勇”这个名字并传开以后，大家的心里更是非常同情将军的不幸遭遇。特别是到了1970年4月底，有一天，部队召开大会。在传达党的九大报告中传来了毛主席关于杨勇同志的指示。大会一结束，部队领导立即宣布恢复杨勇将军的军籍。我看到，将军双手激动地接过领章帽徽，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开心的泪水。从此以后，大家见到将军都称呼他为“老杨”了。

二

1971年的1月31日，大年初五。下午营房里的篮球场上正在进行一场比赛。由于缺人，将军就上场充当裁判。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只球向将军飞来。他躲避不及，摔了一跤。当时将军并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。但是到了当天深夜，将军受伤的腿部疼痛难忍，而且还发起了高烧。留守干部马上向部队领导汇报请示，经过批准，决定由我专门护送、陪同杨勇将军到相关医院进行治疗。我立即跟车连夜把将军护送到邯郸当地的部队医院。经过X光拍片，发现将军受伤的腿部已经骨折。由于医院条件有限，不能收治将军的腿伤。到天亮已经是2月1日。早上，上级通知马上转送到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。中午到达石家庄。一下火车，就见和平医院派来接站的救护车早已等候在站台上了。从邯郸到石家庄，有关部门为了将军的“安全”，一路上给将军戴了一只大口罩进行伪装。还把他的帽沿拉得很低，整个面部就露出了两只眼睛。到了和平医院，将军住进外科病房。这是专门给将军安排的单人病房。在病房的斜对面，有一间“办公室”和“医生值班室”。下午，医院给将军进行拍片、抽血化验和查体温、量血压等全面检查，发现将军腿部骨折部位已经错位严重，伤口感染已有炎症。医生连忙给将军受伤的腿部做骨头牵引，以减少疼痛和便于复位。同时打针服药进行消炎。医生对将军说：“等到炎症控制以后，就要做手术开刀了。”住院第二天，就是2月2日。上午，医生会诊，查过病房后又对将军说：“我们医院外科技术力量强，医院设备好，你要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做好你的手术。”将军对院方说：“我请求你们，把我的腿伤情况马上如实地向北京

和杨勇将军在一起的日子

姚金福



▲ 杨勇林彬夫妇1982年10月1日在苏州虎丘万景山庄（盆景园）门口的合影

【作者简介】

姚金福 江苏苏州市人,1949年10月生,1968年3月应征入伍,1971年3月退伍回苏参加工作,现已退休。

三

我坦然地为杨勇将军去发了这样的一个电报，扪心自问，我问心无愧。通过一年来在连队同将军的接触和对他的了解，我相信将军这个人没有问题，特别是在政治上绝对没有问题。凭什么这样认为的呢？我的依据就是我所掌握的三个事实。第一，在1970年4月份，传达党的九大报告的时候，传来了毛主席对杨勇同志的指示。大会一结束，领导宣布立即恢复杨勇将军的军籍。这表明毛主席在关注杨勇同志。第二，1970年的七八月份，在推举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时候，又传来了毛主席对杨勇同志的有关指示，杨勇将军和董其武将军同时成为选区推荐的候选人。这说明杨勇同志得到了重视。第三，在杨勇将军腿伤住院前前后后的日子里，部队内部正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，开展批陈整风和关于北京军区领导班子进行改组调整的文件。

将军夫人林彬接到将军的电报，第二天带着十五岁的女儿京京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在2月5日下午准时到达石家庄。当年的石家庄车站有两个出口处，中间的距离又比较远。（这个情况，是我去车站接人的当时才发现的。）我一个人去接站，又不认识夫人，如何是好？现在碰到这些事情如果还要称为是问题真是叫人要笑掉牙了。但是四十多年前的我，真的算是碰到大难题了，当时幸亏我急中生智，突然动出脑筋，急忙找来两张大一些的白纸和笔。在一张白纸的上面写道：“请林彬同志在此处等候”把它贴在一个出口处的墙上显眼的地方。在另外一个出口处，我手里拿的一张白纸上写着“接林彬同志”。列车到了。我忽然看到有一夫人携一女孩，一边注视着我手中举着的纸，一边在朝着我走来，我马上意识到，我接着了。出了车站，我们上了一辆敞篷的机动三轮车。身材高挑的将军夫人

▲『努力学习 努力工作』，是杨勇将军送给本文作者的日记本上的题字。

林彬头上戴着一顶毛皮的帽子，双手紧握着车架，迎风站立在车上。夫人略带焦虑，但又非常干练的神情引来了马路两边无数惊诧的目光。

很快，医院到了。我把夫人和京京领进将军的病房。自从将军被打倒以后，夫妇俩已经四年没有见过面了。当时一见面，两人激动得一时竟没有话说。只是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许久还没有松开。夫人是2月5日下午4时左右到石家庄的。但是12个小时以后，她在2月6日凌晨4时又悄悄地离开了将军，离开了石家庄，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。5日晚上，将军和夫人一商量，决定让夫人连夜赶赴北京，再想办法。夫人到京后，在第一天的整个24小时里，硬是没有合一合眼。动了很多的脑筋，跑了不少的路，找了很多的部门和领导，最终还是没有办法。眼看着现在已经是2月7日傍晚时分，正当夫人万般无奈之际，她的三儿子北北的同学小张来看望她。他提醒夫人，是否去找找万里同志？夫人恍然大悟，顿时像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明，我是应该去找他商量商量呀！将军家同万里同志家的战友情谊，说起来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了。特别是万里同志的夫人边涛同志与林彬同志，早在八路军年代，她们俩就在同一个部队参加革命工作。六十年代

初，毛主席、周总理把修建北京地铁工程重要任务交给了杨勇将军。作为北京市政府的代表，万里同志参与了这一工程建设的全过程。他们通力合作，紧密配合，克服困难，圆满完成了毛主席、周总理交给的光荣任务。他们两家从好朋友、好战友变成了今天的老朋友、老战友。2月7日晚上9点多钟，夫人跟着小张找到了万里同志家的新住处。不巧的是，万里同志下放到首钢去了。这几天都住在厂里，不回家。边涛同志和她的大儿子在家接待了他们。听了林彬同志关于将军腿部骨折的情况，边涛同志说：“你在这儿赶快把这个情况写一封信。再想办法给周总理送去。这样一来时间上快，第二把握也大一些。”听了边涛同志的话，林彬同志在万里同志家赶紧找来了笔和纸，马上给周总理写信。这封信写好已是2月7日晚上半夜时分。万里同志的大儿子和小张自告奋勇拿着这封信赶到国务院西门，找到值班的干部，对他说“我们两人是杨勇的儿子，现在重要的事情报告周总理。”值班的干部很负责任，收下了他们送来的不封口的信。立刻就送到周总理晚间召开会议的办公桌上。原来这天晚上周总理正在通宵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，在开会间隙，周总理一看完这封信，马上就连声说“接回来，接回来。”

在此同时，军区保卫部、宣传部两个人，加上医院外科病房的教导员对我的责难和威胁在不断升级和增强。在2月6日这一天，当他们发现夫人已经不在医院的时候，就声嘶力竭地追问我：“林彬哪里去了？做什么去了！”这伙人还歇斯底里朝着我吼：“你马上离开这里！马上离开医院！”我说：“我是我们部队派我来的。我又不认识你们，凭什么叫我走？”这伙人又吼：“是你们部队大，还是我们大？是你们27军大，还是我们军区大！”“现在我宣布立刻撤消你们部队的任务！”我说：“你们权再大，再下什么命令，可是不认识你们。我只认得我们部队。”2月7日下午，我们部队的团长、政委来了。我想，他们是这伙人给找来的。这伙人叫我们的团长、政委来叫我离开将军！离开医院！叫我走。可是这伙人知道吗，团长

政委没有对我说过任何的一句话、一个字。

四

2月8日中午的时候，有通知来了，接将军的飞机下午4时到石家庄军用机场，要提前做好准备。下午3时刚过，医院就要将军上救护车了。我抬着担架，把将军送上了救护车。当我刚要在救护车内坐下来，准备跟车到机场的时候，突然被那个教导员一把拽下来，差一点绊倒摔跤。幸亏被将军发现，严词训斥，那个平旦里虚张声势、狐假虎威的教导员瞬间气势全无，只得让我上车，坐在将军身边一起到机场。机场上空，晴空少云、风和日丽。一个难得的好日子。4时准点，我小心地抬着腿伤的杨勇将军的担架，把他送上了周恩来总理亲自派来接他的飞机。飞机马上要起飞了，我赶紧和将军握手告别，请杨勇将军保重身体。我走下飞机，挥手和在舷窗里的京京告别。

不久，新兵到连队，老兵即将退伍。那一天指导员宣布退伍战士的名单，那最后的一个人，就是。杨勇将军回到北京后，在周总理的直接安排下，住进了301医院，顺利地进行了手术，并且恢复得也很好。手术以后，他不用拐杖，照样能够疾步快走。1982年10月，他来苏州看望我的时候，我还是要慢跑紧走才能跟上他呢！我不禁在心里为将军的健康而高兴。

和杨勇将军在石家庄分手以后的几年里，将军和夫人多次写信真诚地邀请我上他们家做客。1978年10月下旬，我到北京去看望将军和夫人，在将军家小住了几天。到达北京的那一天，因为飞机误点，我到将军家已是晚上8点多钟了。将军和夫人等我到了以后举杯欢迎我的到来。几年不见，将军、夫人面色红润、精神焕发，与在石家庄时的容貌相比，真是变化太大了。第二天，夫人和他们的二儿子冀平兄亲自陪我登上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的八达岭，还为我摄影留念。在京期间，杨勇将军常常在他走亲访友的时候带着我跟他一起去，将军还会很高兴地向大家介绍我说，“这是我的老战友”。这一次，将军趁自己犯牙病、装假牙的时候，在家休假。其间，将军安排我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和周恩来纪念馆。我和将军一起参观了出土文物展览和观看了文艺演出。将军和夫人一直都在关心着我。一九七四年，将军在新疆工作，朝鲜人民军吴振宇大将，受金日成主席委托，在出国访问途中，特意绕道在乌鲁木齐停留，拜访杨勇将军，转达金主席的关心和问候。当时我因为手术原因而身体不佳。将军知道这个情况后，特意托人把金主席赠送给他的红参和药酒带到苏州送给我。当他们听我说起我母亲患的高血压的毛病后，夫人立即找来了她自己正在服用的“脉通”要我带给母亲用。

1978年10月27日，是我这次北京之行的最后一天。晚饭后，在北京西山13号楼，将军的住处，将军夫妇和我亲切话别。他们送给我一张夫妇俩在13号楼前的大尺寸照片留念和一张二儿子冀平夫妇俩的合影照片。将军还深情地对我说：“今后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也会到你们的家乡去看你们的。”四年后，将军诺言兑现。1982年4月初的一天上午，苏州市公安局直接打电话通知我：“今年国庆节，北京有一位老同志要到苏州来看你。”9月30日晚，杨勇将军偕林彬夫人履约来到苏州。我们相见，高兴、激动之情溢于言表。由于将军积劳成疾，这次见面竟成永别！三个月后，1983年1月6日，杨勇将军与世长辞，举国悲痛！

作为一个战士，我只是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。但是将军却是如此厚待我，使我终身难忘！